

民粹國家領導人及其線上防疫傳播之研究： 以新冠疫情下菲律賓總統杜特帝的臉書為例^{*}

張春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新冠疫情（COVID-19）全球大流行下，民粹主義國家領導人是如何利用社群媒體來傳播訊息？透過分析菲律賓總統杜特帝的社群媒體使用，研究發現他的防疫民粹主義傳播風格有四，包括：（1）訴求人民的傳播方式有所改變；（2）打擊菁英和反建制的特色消失；（3）唯一的共同敵人是 COVID-19；（4）寄望中國疫苗。結論進一步指出，杜特帝高度表揚自己的防疫政策、規劃和官員，以及透過違背民主價值觀的方式進行表述，恐形成一種防疫民粹威權主義。

關鍵字：民粹主義、杜特帝、社群媒體、菲律賓、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 本文初始內容係建立在科技部人社中心「新冠病毒與選舉競爭下的假訊息、民主、與民粹」學術研究群一年來的知識交流，感謝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沈有忠教授及學群伙伴的共思共學。本文初稿曾在《新冠病毒的「傳播」，與瘟疫競速搏擊》研討會發表，謝謝政治大學劉昌德教授、陽明交通大學魏均教授給予的寶貴建議。作者感謝研究助理們協助文本分析之編碼及資料彙整。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給予本文的建議，謝謝期刊編輯部於本文審查過程的細心協助。

^{**} E-mail: cychang@mail.ncnu.edu.tw

投稿日期：2021 年 02 月 01 日；接受日期：2021 年 11 月 12 日

壹、前言

民粹政治 (populist politics) 雖是民主社會廣為人知的現象，但其傳播面向相關的研究經常受到忽略 (Aalberg & de Vreese, 2017)。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傳播環境因為網路和社群媒體的興起發生劇烈的變化，形成傳播民粹訊息的機會結構 (Esser, et al., 2017)。但如何從傳播角度分析此現象，則尚缺足夠研究。近年來有研究者聚焦在民粹主義者如何利用社群媒體進行傳播，並認為這種分析具體傳播內容與過程的研究方式，已成為當代民主政治研究中的新興重點 (de Vreese et al., 2018; Mudde, 2004; Mudde & Kaltwasser, 2012)。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認為 2020 年一月蔓延全球的 COVID-19，成為一個值得探索民粹主義的重要背景。理由在於這波面對新冠病毒又備受世界媒體關注的領導人物，不少是善用社群媒體而勝選的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然而這些政治人物贏得大選、位居統治地位後，在治理新冠疫情的作為上，卻又備受挑戰。諸如〈新冠病毒期間，民粹主義領導人負有責任嗎？〉(Lassa & Booth, 2020, April 8)、〈新冠狀病毒大流行威脅民粹主義強人〉(Zabala, 2020, April 21) 等新聞報導，批評點名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John Trump)、巴西總統波索納洛 (Jair Messias Bolsonaro)、英國總理強森 (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爾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等人，因防疫不力民調應聲直落。由此衍生的相關議題，實有賴以傳播的角度進行具體研究。為聚焦討論，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下，民粹主義國家領導人是如何利用社群媒體來傳播相關訊息？

在亞洲，菲律賓總統杜特帝 (Rodrigo “Rody” Roa Duterte) 是具指標性的民粹主義國家領導人，自 2016 年以來，杜特帝就與美國總統川普一同成為全球媒體所標籤的民粹主義領袖。就研究而言，已有不少文獻直稱杜特帝為民粹主義總統 (如 Arguelles, 2019; Montiel et al., 2019)，另有一些研究則探討杜特帝的作為和其對菲律賓社會的各面向影響 (Coronel, 2019; Curato, 2017; Saguin, 2019)。此外，杜特帝當選前當選後，都以善用社群媒體著稱，CNN 更直稱他為社群媒體總統 (the social media president) (Bueno, 2017, June 30)。因此，本文以菲律賓總統杜特帝在防疫期間的社群媒體使用作為經驗個案，分析自 2020 年 1 月新冠疫情大流行開始至 7 月這段時間，杜特

帝臉書粉絲頁的使用，以此回應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

貳、文獻回顧

一、民粹主義作為一種傳播現象

廣義的民粹主義是指，使某項議題廣為流行、受到喜愛或支持。若將概念聚焦在當代的政治傳播環境，則是指政治人物直接訴諸民意、獲得人民支持的一種政治行為（張佑宗，2009）。然而這種看似彰顯直接民意的政治行為，卻可能造成若干問題。既有研究關注到，作為一種政治動員的機制，民粹主義者一方面經常藉由推崇人民的智慧、美德，宣揚直接民主；另一方面，則是強調菁英的邪惡與腐敗，因而忽略既有政治制度、理念的價值（Taggart, 2000）。進一步，在建構人民認同的過程中，更常以反智的方式進行動員，特性包括：（1）善於訴諸集體意志，動員不理性的群眾，而非動員公民進行理性溝通；（2）因此無法真正改變社會中既存的宰制關係與政治壟斷的狀況；（3）這樣的政治動員，相當程度是妨礙民主制度與社會多元的發展（林淑芬，2005）。換言之，民粹主義的特徵是力圖造就：不信任既有政治制度，以及學者專家、官僚和代議士等。因此很可能帶來了不尊重民主制度，及潛藏威權統治的問題（黃昱珽、蔡瑞明，2015）。

民粹主義政治人物所聲稱的人民，是一群定位不明的人，不一定是包含多數國民或公民群體。民粹主義者常利用既存的偏見，將人民視為是一群無差異的群體，並使這群被動員的人民相信，他們正受到菁英／優勢階級所否定、鄙視或剝削。因此就當代民主觀點，民粹主義往往被學者以帶貶抑的方式來指稱，政治人物藉由使用八卦、羶色腥、過度簡化的或庸俗的政治傳播方式，煽動人民、使人民騷動不安且利用人民既存偏見來取得人民對其政治上的支持（Fuchs, 2018）。

而人民之所以能夠被以偏見動員，有其社會根源。政治學者陶儀芬即認為，全球化的背景下，造成人民無法透過在自己國家的政治參與來決定自己的生活，因而使當代民粹主義興起。她認為「全球化帶來的民主赤字使得公民對於民主制度、代議政治、政治菁英和政治制度產生疏離和怨懟，助長了民粹主義的盛行」（陶儀芬，2008，頁 223）。

當代民粹主義具備三項共通的特質，包括：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

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抱持對立的立場，以及民粹主義者會強調自己才是真正代表人民（Gerbaudo, 2018）。因此政治人物會採取個人英雄主義，透過選舉機制直接訴求人民的動員模式，回應人民要求，並在此過程訴求反菁英、反建制（張佑宗，2009；Postill, 2018）。

民粹主義領袖及其追隨者，則具有一種的特殊信賴關係，能使追隨者相信其特別有能力理解人民並滿足人民的需求。相對的，民主制度仰賴和建立的辯論、審議、制衡與平衡，或尊重少數人權利，則被認為是不必要的（Abts & Rummens, 2007; Canovan, 1999; Filc, 2011; Müller, 2014）。

然而，民粹主義究竟是透過什麼樣的傳播過程，而建構出上述的意涵和關係？這是過去研究較少討論的面向。Smith（1986）是少數凸顯研究民粹主義不可忽略傳播概念的學者。他將民粹主義定義為：政治人物透過傳統符號、象徵，建立人民為體質一致的想像共同體，藉此區分「我們」與「他們」的差異認同。由此，對內會力圖降低領域之內的各種來自階級、性別、身份、地域等因素造成的差異。這樣的人民建構過程，則是為了滿足其政治目的，也就是使其能夠代表人民，以此取得政治權力（Smith, 1986；轉引自王振寰、錢永祥，1995）。

在 Laclau（2005）的研究中，則明確提出，民粹主義最核心的政治邏輯就是涉及到一種政治傳播訴求，以此來串連人民對抗一個被創造的共通敵人（common enemy）。民粹主義者除了運用人民的符號，還會敵對化宰制集團，將之建構為與人民為敵的組織。並且採取以一種具有煽動、分裂社會的傳播方式，將社會上既存的不同群體對不同議題、不同訴求的主張，透過指認和說服來形成共同敵人。這種民粹主義傳播過程，有助於建立存在差異的人民的團結連帶感受（以一種同仇敵愾的方式）。透過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意義指涉體系，來形成新的社會想像，建立一個將人民統合起來，以及使人民與傳統的權力集團，形成內在敵意的疆界（林淑芬，2005）。上述相關研究之聚焦，即是針對民粹主義者的傳播內容進行分析，特別是探索其傳播內容所展現的特殊風格元素和語言使用。

同樣強調傳播過程，晚近有研究者便主張，要從民粹主義傳播的主要特徵出發，分析不同行為者利用這些特徵的程度（de Vreese et al., 2018）。事實上，Jagers & Welgrave 這兩位學者過去即提出民粹主義作為政治傳播風格（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yle）的概念，並認為這有助於清楚分析具體的傳播內容。兩位學者指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傳播風格，首先其總是指涉人民

並且透過訴求和定義人民（誰是所謂的人民），以此來證成其行動；而這樣的傳播方式，是根植於反菁英的感受，並且將人民視為無差別、同質化的群體，另一方面則針對特定群體採取排除在外的策略，建立人民成為特定的想像共同體（Jagers & Welgrave, 2007）。

民粹主義亦可區分為薄的（thin）和厚的（thick）民粹主義。所謂薄的民粹主義作為傳播風格，其僅會訴求人民，傳播風格則是展現親民之姿，並且以人民之名說話、聲稱其代表人民。為達成上述目的，民粹主義者會使用口語化的語言；厚的民粹主義除了前面提到的訴求人民之外，還包括訴求反建制和排除某些群體。反建制或反菁英主義作為傳播風格，強調疏遠人民與菁英之間的關係。諸如人民必須對抗的菁英是一群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且只會追求他們的個人利益。民粹主義者會以簡單歸因的方式，將人民的不滿和負面的生活經驗，歸咎於菁英的無能及其無意願維護人民的利益。所謂的菁英，可以是政治菁英（政治人物、官員或政黨）、媒體（媒體大亨、記者等）、知識份子（大學、作家或教授），或者經濟菁英（多邊國家組織、老闆、貿易聯盟、資本家）；排除某些團體，則是因為人民被建構為同質的一群人，共享利益和擁有共同的特質、美德。沿此，民粹主義不但強調菁英與人民差異，疏遠兩者，同時也會辨認某些團體為他者，藉由指認、污名化，指其價值、言行與一般人民不相容等方式，排除他者於人民之外（Jagers & Welgrave, 2007）。整體而言，將民粹主義視為是一種傳播風格的研究取向，一方面可以避免民粹主義概念模糊不清的問題；另一方面亦可探討其如何使用特定的修辭、傳播方式。

二、民粹主義與社群媒體

過去研究民粹主義與媒體的關係，較為忽略網路或新媒體在傳播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晚近一些研究注意到，民粹主義者會使用網路來規避既有的主流媒體之守門，透過新媒體傳播民粹主義訊息，方式包括：貼短訊息、使用負面情緒的語言，呈現醜聞指控以及傳播動員訊息。這些經驗研究發現，隨著社群媒體日益普及，更有助於民粹主義傳播（Ernst et al., 2017; Moffitt, 2016）。

網路應用平台所具備的功能，包括再現民粹主義領導者與人民的關係、排除外團體、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概念推衍，發展民粹主義生活方式與認同，

以及規避傳統媒體的守門（Krämer, 2017）。而這種線上民粹主義所帶來的負面傳播現象，包括攻擊菁英、排除他者、散佈惡意訊息、網路情緒攻擊等（Engesser et al., 2017）。因為社群媒體業者採取演算法會形成一種偏好設定，讓使用者在社群媒體環境更容易接收到鞏固自身意識形態立場的訊息、意見，意見相近的網友亦容易形成連結互動。因此，民粹主義者的社群媒體使用，正是藉由這樣的媒介特徵來聚集網路民意和線上認同，將之轉化為激烈的政治支持者（Gerbaudo, 2018）。

Krämer (2017) 研究指出，隨著社群媒體平台越來越受到工具化的使用，政治人物越來越會以此媒介來表達個人獨特的民粹主義內涵。民粹主義者運用網路空間，常見的操作是：將人民不滿的聲音，轉化為一種世界觀，成為抗議和投票的理由，或是利用零星事件、特定生活經驗，轉化成鞏固政治立場的世界觀。歸納社群媒體有利於形成民粹主義傳播，則體現在社群媒體既有的傳播功能，具備呼應民粹主義的特質（請參見下表 1）。

表 1：社群媒體與呼應民粹主義的傳播功能

社群媒體既有傳播功能	社群媒體適用於民粹主義的傳播功能
提供和接收資訊，包括詮釋、意見表達和論辯。	展現和精心建立意識形態，用一種特定的世界觀（例如反菁英主義、排斥外團體）來框架和評估事件。
展現和協商個人認同	自我社會化形成民粹主義的世界觀，包括信念、符號的採用，實踐民粹主義
建立和娛樂社會關係	示範人民的再現，形成一種由上而下的領導宣稱和歡呼（例如按讚和分享）
協商集體行動和內容生產，或者組織線下活動	藉由菁英和外團體成員的不當行為的資訊傳播，將之視為零星證據來累積和建構人民受到敵人威脅的認知
為了提供個人化的服務和內容，形成自動的資料產出	選擇性暴露在民粹主義世界觀的訊息之中，以不斷確認民粹主義的內涵。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Krämer (2017, p. 1305)

上述研究成果一方面說明了，社群媒體所展現的數位傳播環境，不見得帶來更多元、有利於民主對話的媒體環境。相反的，更有利於具意識形態的網友，形成鞏固彼此自身意識形態立場的連結互動。另一方面，透過社群媒體的互動文本，則有助於研究者分析和瞭解，民粹主義是在什麼樣的傳播過

程，形構成偏狹的政治觀。

三、疫情下的民粹主義傳播研究

上述民粹主義作為一種傳播現象的討論，多體現在政治動員的脈絡。相對的，COVID-19 疫情大流行涉及公共衛生與非日常的風險情境，則疫情如何影響民粹主義的傳播？需要進一步的文獻回顧。

回顧近兩年相關研究，可以看到不少實證研究探索民粹主義與 COVID-19 在民主國家的政府治理問題。如近期有研究指出，民粹主義政府在面對疫情帶來的嚴重公衛議題的狀況下，經常會採取輕忽病毒所帶來的嚴峻問題，或者採取短效的政策作法。此外，領導人常會避免限制人民的互動和避免強制人民戴口罩 (McKee et al., 2020; Smith, 2020)。

將防疫視為是一種政治行為，Dodds 等人 (2020) 的研究聚焦在政治人物的疫情傳播所帶來的影響。該研究認為，政治人物如何解釋疾病及疫情發展，將影響政策走向，連帶也會影響人民面對疫情的方式。因此可以看見非民粹主義的國家較傾向採取非懷疑論的立場，會依循專家知識、認真看待疫情的嚴重性，並且訴求國家團結一致進行防疫。在防疫治理上，政府會採取戴口罩、建立人與人的社交距離或者封城隔離，施打疫苗等措施。人民也較能夠與政府團結一致對抗疫情；相對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則是往往採取懷疑論，以反專家知識的方式，使得官僚體制受到干擾，民粹式的疫情解讀和資訊傳遞，也會影響廣大支持者開始不信任醫療專業、防疫政策，以及採取輕忽的方式面對疫情。

在具體的經驗研究上，Lenka Bušítková 與 Pavol Baboš 兩位學者於 2020 年的研究，以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國為例，研究指出，這兩個國家在面對第一波疫情時，雖然採取專家意見進行政策推動，因此在疫情初期出現較好的防疫。然而兩國未能夠利用時機進行防疫準備，包括醫療量能的建立，對於染疫熱區的框列、採取必要的隔離措施等，反而是回應人民想要出外度假的想望，立即放鬆管制而招致疫情危機升溫。此外，兩國政治人物利用緊急命令的方式，繞過體制進行防疫措施，強化政治權力的同時也迴避民主體制的監督 (Bušítková & Baboš, 2020)。由此，兩位研究者指出，民粹主義政治人物面對疫情危機時有三種特色：(1) 會採取繞過制度和既有的體制進行防疫政策推動；(2) 回應疫情危機時，防疫政策會出現不穩定的情況（忽緊

忽鬆)；(3) 會利用政治化的方式，取得執政合法性、滿足其政治目的（同上引）。

聚焦於傳播特質，Aline Burni 與 Eduardo Ryo Tamaki 兩位學者於 2021 的研究指出，民粹主義傳播者在面對疫情爆發時，如美國總統川普、巴西總統波索納洛，儘管出現防疫表現不佳。但這些領導人卻反倒利用這樣的危機來進行民粹主義操作，以維繫其支持度。其傳播內容大體反映在：(1) 對公衛相關科學知識採取懷疑論 (scepticism)；(2) 其所傳遞的資訊和決策依據的缺乏透明 (lacked transparency)；(3) 面對疫情，採取激化社會分裂的手段進行 (Burni & Tamaki, 2021)。

兩位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巴西總統波索納洛面對疫情的民粹傳播現象，研究發現：首先是他會利用社群媒體，來創造人民與自己的親近性 (proximity to the people)。這讓他的民粹語言可以不用受到傳統媒體的專業監督和過濾，直接訴求人民 (Burni & Tamaki, 2021)；其次是創造敵人 (creating enemies)，波索納洛將主流媒體、地方政府建構為人民的敵人，他會指責主流媒體對自己的批評，並指控主流媒體是散佈假新聞且對其發動資訊戰 (information war)，此外他也會責怪菁英，指控菁英企圖弱化中央政府因應疫情的能力（同上引）。最後，波索納洛藉由弱化人民對於主流媒體、專家與政治菁英的信任後，讓更多支持者去關注他的個人社群媒體。藉由社群媒體傳播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波索納洛，將支持者建構為好的人民，將批評者建構為人民的敵人，此外他將自身建構為親民的一般人 (normal man)，又是在防疫時具有解決問題能力的救世主 (the saviuor) 或超級英雄 (the superhero)。藉此完成「化危機為轉機」的過程，達成贏得人民政治支持的目標（同上引）。

針對菲律賓總統杜特帝的防疫狀況，近期也有若干的研究成果。根據 Teehankee (2021) 的分析，自菲律賓爆發本土疫情開始，杜特帝就開始展現出與其他國家的民粹主義政治人物不一樣的作為。諸如菲律賓爆發本土疫情後，杜特帝就結合醫療專家、技術官僚和商業代表，成立菲律賓政府跨部門抗疫工作小組 (philippines inter agency task force, IATF)，主責全國防疫工作。同時，也立即採取嚴格的封城措施（同上引）。另一方面，作為政治強人，杜特帝卻在面對中國時始終示軟，事實上從杜特帝剛上台時就明顯轉變菲律賓原有的地緣政治結盟 (geopolitical alliances)，大幅度轉向親近中國。杜特帝也不時公開表達與習近平具有特別友好的關係。反應在疫情期間，杜

特帝便強調：菲律賓要從 COVID-19 中恢復正常，必須依賴當時中國正在發展的疫苗（同上引）。在杜特帝民粹主義風格之中，有研究者早注意到「疏美親中」是很重要的元素（Montiel et al., 2019）。從平時到疫情危機時刻，杜特帝依舊採取親中作法，不斷表達防疫要仰賴中國。這解釋了何以杜特帝會特別凸顯中國疫苗才能救菲律賓，其實是反應在杜特帝自上任總統以來，既有的民粹主義作風之上。

菲律賓學者 Karl Hapal 以安全化大流行疫情（securitising pandemic）的概念，研究杜特帝如何進行民粹主義傳播。研究發現，杜特帝將菲律賓政府防疫工作，以戰爭化的隱喻進行修辭構築，將 COVID-19 病毒比喻為看不見的敵人（unseen enemies），大量採用軍、警進行強勢的防疫管控，維繫其 2020 年 3 月以來的嚴格社區隔離政策（Hapal, 2021）。

綜合而言，民粹主義者的防疫傳播，在 COVID-19 疾病大流行期間的運用，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鞏固政治權力的政治傳播。民粹主義領袖使用防疫民粹語言，不僅是運用來傳播民粹意識形態，背後更反應了維護執政權力的政治目的。然而，既有研究也發現，同樣被冠上民粹主義領袖，其防疫措施以及其傳播的方式也不見得全然相同（Katsambekis & Stavrakakis, 2020），因此透過個案研究其具體傳播過程，有助於累積相關知識。

參、研究方法

在進行杜特帝社群媒體的資料蒐集上，調查發現他有兩個主要使用的社群媒體：推特（Twitter）與臉書（Facebook）。在進行資料蒐集過程，首先檢視杜特帝的個人 Twitter 帳號 Rodrigo R. Duterte @RRD_Davao（https://twitter.com/rrd_davao），自 2012 年月開通後開通共有十八萬三千餘位追隨者，然而自 2019 年 3 月 21 日，即不再更新貼文，其先前推文未涉及本研究關切的防疫民粹之主題，因此不列入資料蒐集範圍。另一方面，在其 Tweet 帳號首頁介紹資訊中，也刊登杜特帝臉書粉絲頁的連結，凸顯出臉書的重要性。

相較之下，菲律賓總統杜特帝的臉書粉絲頁 Rody Duterte（<https://www.facebook.com/rodyduterte/>）該臉書粉絲頁自 2009 年 12 月 6 日成立，即杜特帝在擔任菲律賓第三大城市達沃市（Davao City）市長時即設立，該臉書共有四百四十七萬餘的臉書使用者按讚，有四百五十萬餘人追蹤。根據 Bajar

(2017) 研究指出，該臉書是杜特帝最主要的社群媒體。在杜特帝投入 2016 年總統競選期間，該臉書也是其最主要的政治競選自媒體，並且有持續發文。而杜特帝以臉書作為主要社群媒體使用，也跟菲律賓人有高比例（97%）的網友具有臉書帳號、愛用臉書有關（Etter, 2017, December 7）。因此，本研究以杜特帝臉書粉絲頁作為資料蒐集及分析對象。

依據研究目的及問題，本文蒐集自 2020 年 1 月 COVID-19 全球大流行後，至 7 月底為止的臉書粉絲頁資訊。總計有 17 則發文，有 14 則是以 COVID-19 疫情治理或因應為主題的內容，其他三則則無關，總瀏覽人數高達 14,177,864 人次。¹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進行研究，根據 Yin (2013) 指出，個案研究法係指針對社會現象進行經驗研究，其在研究方法上則是採取多重的經驗資料來源（multiple sources of evidence）進行個案之分析。本文資料蒐集區分兩部分，第一部份檢視杜特帝臉書發布有關 COVID-19 的相關議題及臉友回應狀況，這部分本研究採取量化的內容分析方式，首先參考 Bajar (2017) 有關臉書的互動研究，該研究所使用的分析類目，原本係建立在探索杜特帝競選總統時，網友與其臉書的互動狀況。將之建立在杜特帝臉書粉絲頁有關防疫發文的網友互動之檢視上，由此修正訂定操作型定義為（1）杜特帝在防疫期間，其臉書粉絲頁發文的頻率、方式；（2）互動程度：在防疫期間，杜特帝粉絲頁獲得臉友喜愛、回應和分享等總數。前兩個分析類目使用，為的是蒐集、分析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利用社群媒體進行防疫政治傳播，以檢視其如何帶動網友的反應。

然而本文認為，前述兩項類目，無法看出其防疫表現和民粹主義傳播的方向性。因此增加第三項編碼，即（3）網友對杜特帝臉書粉絲頁之留言、回應之正、負方向性：即在防疫期間，網友針對其每則發文所提出的正、反意見回應數。資料蒐集程序是，先於編碼前擬定類目定義，本研究將支持性留言的類目，定義為網友在臉書粉絲頁留言中表達對杜特帝防疫傳播內容之正面支持、感謝之留言；而反面留言，則是指對於防疫現況或防疫政策提出直接批判之發文者。此外，考量菲律賓施行總統制，總統代表政府施政的最高決策者，因此本研究亦將網友對於菲律賓政府防疫表現之貼文，表達不同

1 由於臉書具備演算法的機制，為避免因帳號連結影響臉書資料呈現。本研究資料蒐集過程，所有資料蒐集人員是採取先登出個人帳號、再進行粉絲頁連結的方式，統計及複製這段時間杜特帝臉書粉絲頁的臉書發文及每則臉書上的臉友回應，包括按讚、大心、分享或留言等。

意見或提出質疑等，視為是負面方向之意見，反之則為正面意見。第三類，則是非第一類或第二類，也就是看不出支持或反對之留言，則歸類為其他。

由於 17 則留言數共有萬則的留言數，所需判讀資料量較大，因此本研究招募六位以東南亞區域研究為主修的編碼員進行分工，其中包含 2 位東南亞籍、4 位臺灣籍學生。在進行正式編碼前，本研究先對編碼員進行訓練。然後隨機挑選杜特帝臉書上的十則留言組進行實行編碼試測，計算編碼員間的相互同意度達 0.862 之水準，判斷達成一般內容分析可接受之標準，而後再進行編碼。

第二部分則是採取質化的文本分析，針對臉書上如何呈現防疫民粹主義的傳播風格及訊息，這部分是首先將 14 則之中，以影像呈現之杜特帝臉書發文有 13 則，均轉謄為可進行文本分析之逐字稿，並由研究者單獨分析。具體操作方式，區分為兩個層次的文本分析。首先是民粹主義傳播風格的主題歸納，即透過杜特帝臉書相關發文之文本進行主題編碼，並進一步找出杜特帝臉書有關疫情民粹主義傳播的風格內容之主題分類。根據 Jagers & Welgrave (2007) 的研究所指出，民粹主義傳播風格涉及民粹主義者運用語言傳播三大主題，包括訴求人民、訴求反建制／反菁英，以及排除某些群體於人民之外，進行基本的主題分類。此外，考量疫情民粹主義風格可能具有在地性差異，因此本文亦將藉由既有理論框架，從實際經驗資料中，歸納出可能的杜特帝防疫民粹主義傳播風格主題。

第二是進一步分析其如何利用句構修辭進行具體的民粹主義傳播。參考 Popping (2018) 有關民粹主義傳播之文本分析策略，其認為在訴求人民、反菁英和排除某群體於人民之外，應進一步分析民粹主義者如何運用特定的語言修辭進行民粹主義傳播。該研究認為，應該聚焦分析主詞在句子的用字遣詞，藉由分析句子之主詞、動詞、受詞的修辭，進行文本分析。典型的民粹主義風格中之句子用法，如在訴求人民的主題之下，常會出現的主詞與動詞之間的句構修辭是「（我們）人民遭到背叛」、「人民不能被忽視」等等。相較之下，反菁英則經常會出現「他們說謊」、「他們系統性的毀滅國家」等等。此外，在受詞句構之中，可以見到「捍衛義大利人（受詞）的利益」（同上引，頁 2165）。

由於菲律賓採取英文和菲律賓語／克加洛語 (Tagalog) 雙國語制度，因此不管是杜特帝臉書發文或臉友留言內容，經常會出現英語和克加洛語交雜使用之情況。為克服語言限制，本研究以翻譯網站 (<https://www.>

tagalogtranslate.com/translate.php) 將克加洛語均翻譯為英語，再進行文本內容之編碼與文本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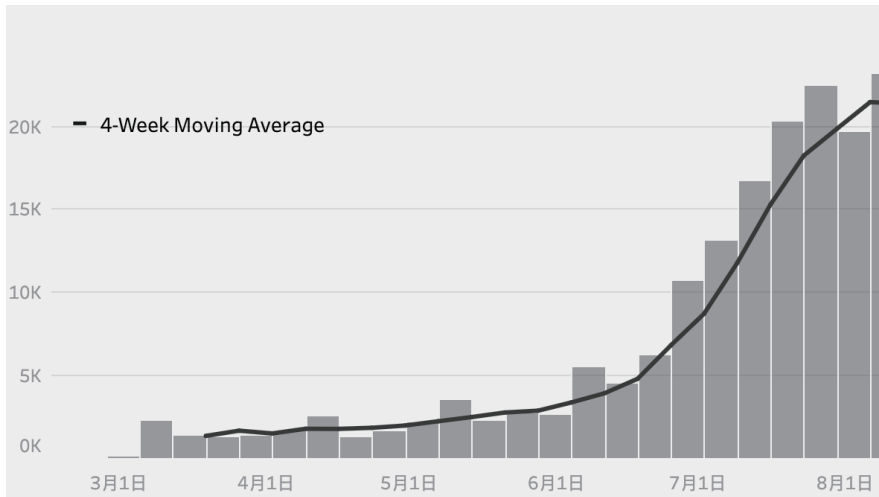
肆、研究發現

一、菲律賓防疫事件個案說明

自一月新冠肺炎爆發以來，杜特帝政府起初並未重視此問題的嚴重性，這跟初期菲律賓未發生嚴重的本土傳染病疫情有關。根據菲律賓衛生部所建制的新冠疫情案追蹤系統 (COVID-Case Tracker)，1 月份菲律賓尚只有個位數到十位數的零星確診案例。2 月 27 至 3 月 4 日，一週內確診人數提升到 158 例，3 月 5 日到 3 月 11 日急遽升高到一週確認 2,367 例，此後直到 6 月初，案例大約都維持在一週確診兩千多例。至 6 月 4 日之後，案例則翻倍到一週 5,000 至 6,000 例，6 月 25 日至 7 月 1 日這一週確診累計突破 1 萬，數字持續上升。截至本研究資料蒐集為止，7 月最後一週的累計確診案例，來到 22,468 例 (請參見圖 1) (COVID-Case Tracker, n.d.)，而 7 月 31 日為止總確診人數來到 93,354 人，死亡人數 2,023 人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n.d.)。

因為菲律賓國內染疫的確診人數急遽變化，杜特帝政府也從早期的輕忽以對，隨著時序逐步提出越來越多政策作為，企圖遏制新冠肺炎的擴散 (Lasco, 2020)。本研究整理有關菲律賓因應新冠疫情的大事紀，菲律賓政府對於新冠病毒疫情的政策作為，1 月 28 日成立傳染病緊急管理跨部會小組 (IATF)，此後開始主責防疫政策。同時建制專門網站 (doh.gov.ph/2019-nCoV)，並於定期進行案例公開資訊、舉行例行記者會。1 月 31 日菲律賓總統杜特帝針對中國的湖北省和任何一個有疾病傳播的都市下達旅遊禁令。隨著疫情在菲律賓日漸嚴重，3 月 8 日杜特帝宣布進入公衛緊急狀態，並允許軍警逮捕未遵守疫情規定者；3 月 12 對所有出現本土傳染案例的國家下達旅遊禁令；3 月 15 針對大馬尼拉地區進行首次社區隔離至 4 月 14 日，除禁止大型集會，陸海空交通也宣佈暫停；3 月 17 日呂宋島進一步宣布進行強制社區隔離措施 (Office of the Presidential Spokeperson, 202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May 9)。3 月 24 日經參眾兩院通過，杜特帝於 3 月 25 日正式簽署《團結互助抗疫法》 (*Bayanihan to Heal as One Act / Republic*

圖 1：菲律賓 COVID-19 染疫確診（2020/01/01~07/31）



資料來源：COVID-Case Tracker (n.d.). Retrieved from <https://doh.gov.ph/2019-nCoV>

Act. No. 11469），使杜特帝能以抗疫名義動用特別預算、人力和物資，並擴張其行政權力。另一方面，該法案也讓他可以使用特別預算來支付前線醫療人員額外工作給付，以及在法律授權的這兩個月期間，給予低收入家戶每月 5,000 到 8,000 比索（換算臺幣為 2,953~4,724 元）的援助金。（Senate of the Philippines, 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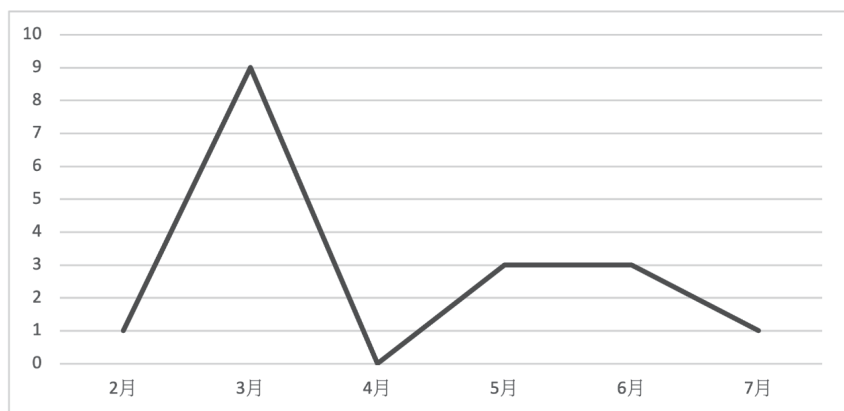
4 月 13 日菲律賓成為東南亞國家中當日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4,932 例），4 月 24 日菲律賓加強型社區隔離令，擴大至馬尼拉大都會區及呂宋島其他高風險省份。5 月 29 日確診案例持續增加，6 月 4 日確診來到兩萬例，6 月 5 日公布 4 月份有 73 萬菲律賓人失業。7 月 1 日財政部長呼籲馬尼拉大都會區及卡拉巴松地區應盡速更改為「改良式一般型社區隔離」。7 月 16 日總統發言人針對外界指稱疫情趨緩的現象提出反駁，強調經濟重新開放，案例會再次增加。（Bautista & Lopez, 2020; Malindog-Uy, 2020; Wikipedia, n.d.）從實際的染疫統計數字來看，7 月底確診人數確實持續擴大。

上述菲律賓疫情概況與菲律賓政府於 2020 年 1 月至 7 月的具體防疫作為，有助於本研究理解菲律賓有關 COVID-19 的社會脈絡，由此進一步針對在杜特帝臉書粉絲頁上所呈現的 COVID-19 的防疫民粹主義風格，進行相關文本分析。

二、疫情下杜特帝臉書發文概況

2016 杜特帝在競選總統時，因其民粹主義特質，就被媒體對比同樣競選總統的川普，而被譽為「東方川普」（《自由電子報》，2016 年 11 月 10 日）。然而從其臉書粉絲頁可以發現，杜特帝在當選後並未如選前那樣地頻繁使用社群媒體。自 2020 年 1 月至 7 月，杜特帝的臉書粉絲頁僅有 17 則的發文，而 1 月到 7 月之間，其中 1 月份和 4 月並無任何發文，發文最多集中在 3 月共有 9 則，5 月、6 月各有 3 則，2 月和 7 月則分別只有 1 則（請參見圖 2）。

圖 2：杜特帝臉書粉絲頁每月發文統計（2020/01/01~07/3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菲律賓總統杜特帝臉書粉絲頁 Rody Duterte (<https://www.facebook.com/rodyduterte/>)

企圖瞭解發文比例是否因為防疫狀況有所改變，本研究比較 2016 年 5 月杜特帝參與總統大選結束前後的發文狀況。2016 年 1 月到 7 月共有 120 則，其中 117 則是在 1 到 5 月的發文，顯見總統大選前杜特帝臉書出現較多的發文。進一步觀察其當選後的歷年發文量則維持低量，2017 年 1 月至 7 月僅有 9 則，2018 年 1 月到 7 月共 36 則，2019 年 1 月至 7 月僅有 4 則。然而相對於 2017 年、2019 年的 1 月到 7 月，2018 年 1 月到 7 月的發文明顯增加，亦跟選舉宣傳有關。該段時間，杜特帝的政治親信 --- 克里斯多福·吳（Christopher Lawrence “Bong” Tesoro Go）開始投入參議員選舉，在這段時間的臉書發文，經常出現宣傳 Bong Go 或鼓勵網友投票給 Bong Go 的發文。顯見 2016 年的大量發文，以及 2018 年相對較多量的發文，都跟選舉宣傳有

關係。而這類政治宣傳發文的內容組成，大多會由短文字搭配影像或者圖片的複合式訊息呈現，以呼應特定的議題主旨：投票或者塑造政治候選人形象。其他非選舉期間的發文，則少有小編文字或以第一人稱（杜特帝）的發文陳述，而多以單純的照片或影片呈現。

若單純比對沒有涉及選舉的 2017 年（9 則）和 2019 年（4 則）的發文數，2020 年的 17 則是呈現發文量增加的情況。進一步檢視 2020 年發文量增加，可以發現主要跟 COVID-19 疫情在菲律賓爆發有關。因為就發文主題而論，17 則發文，僅有三則與 COVID-19 無關。而 14 則以 COVID-19 為主題的發文，除了編號 7 的發文（2020/3/22）是以總統文告形式（PDF 檔案），內容是呼籲全國人民一起禱告共同抗疫。其他 13 則發文均為轉發影片播出形式呈現，且這些發文除了連結影像以及原連結處的說明文外，發文內容並沒有再增加任何分享文字（無小編文或者杜特帝個人發文）。13 則影像僅有兩則沒有杜特帝本人公開現身談話，僅是傳染病緊急管理跨部會小組的開會討論影像，分別為編號 3 則（2020/3/16）及第 4 則（2020/3/17）發文。其他貼文，均為影像播出，內容也均為杜特帝本人主持傳染病緊急管理跨部會小組會議，或是針對防疫問題對菲律賓人民發表公開談話的內容。初步可以觀察到，這段時間杜特帝臉書上疫情相關的影片長度，可以區分較長的影片（包括編號 2、5、12、15、16、17），均為杜特帝出席 IATF 防疫會議討論，由於是會議影片形式的影片，因此有較長的影片長度，也會出現杜特帝針對議題較多的發言情況。相較之下，以記者會形式、或者杜特帝於總統府面對鏡頭進行公開發表談話，以及事先製作由杜特帝擔任主角的防疫宣傳影片，影片長度較短（編號 1、6、8、9、10），這些影片內容屬性上是以訊息單方面傳達為主，因此影片長度較短（相關概況，請參考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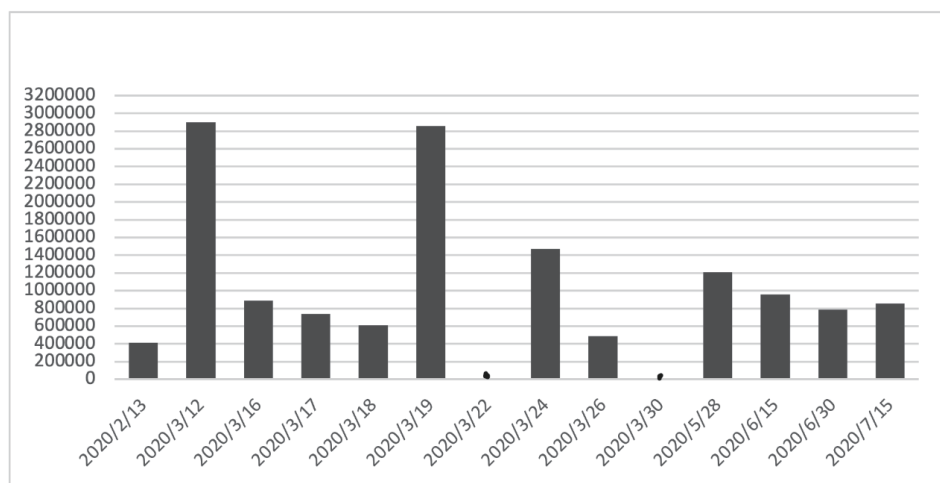
三、疫情發文與網友互動狀況

（一）疫情發文狀況與瀏覽人數統計

就疫情發文之瀏覽人數進行統計，截至 7 月底資料蒐集截止，14 則發文總觀看人數高達 14,184,363 人次。其中突破百萬觀看人數的發文分別為第 2 則（2,899,373）、第 6 則（2,857,679）、第 8 則（1,471,913）、第 12 則（1,208,524），均為杜特帝在鏡頭前親自對全國民眾發表談話，或主持跨部門

防疫會議。整體而言，觀看人數從初期維持較高人數，有將近三百萬人高峰，進入到3月至6月，除了編號第12則發文（2020/05/28）有1,208,524人次，其餘幾則發文觀看人數有明顯下滑。甚至，可以看到有兩則疫情發文，僅出現數千人瀏覽數的情況（請參見圖3）。

圖3：杜特帝臉書粉絲頁之疫情發文及瀏覽統計（2020/01/01~07/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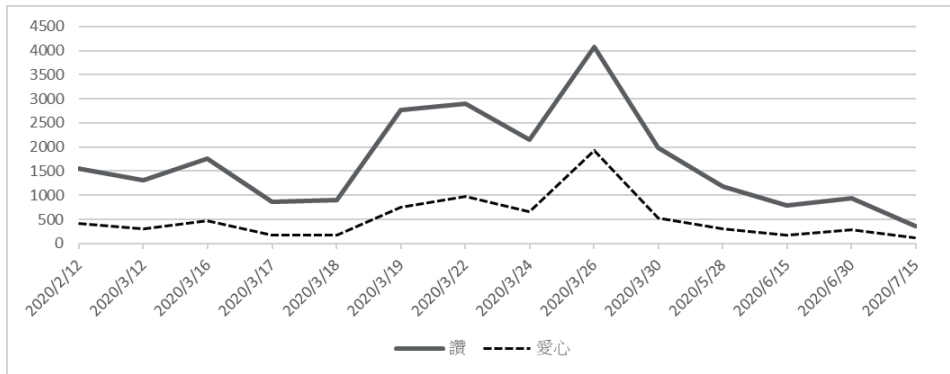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菲律賓總統杜特帝臉書粉絲頁 Rody Duterte (<https://www.facebook.com/rodyduterte/>)

（二）疫情發文及按讚與愛心統計

就14則疫情發文的按讚數而言，累計有23,527個按讚數，愛心7,275個，其他表情符號則均在千人以下（大笑257；怒255；驚訝146；哭泣193；抱872）。其中獲得按讚數最高為第9則發文（2020/3/26），贏得4,078個按讚數，該則影片是一則1分42秒的政府文宣短片，內容以杜特帝帶著平和、堅定的聲音為旁白，內容除了杜特帝坐在鏡頭前的畫面，也穿插、剪輯在空中飄揚的菲律賓國旗、防疫的人員、菲律賓街頭的軍警和人民的防疫身影等，整個影片杜特帝以英文和塔加洛語夾雜，向菲律賓人民保證會引領人民度過COVID-19的挑戰。這則發文同時也在14則發文中，贏得最多的愛心（1,930）和最多（也是唯一破千的）轉貼分享（1,198）（請參見圖4）。

圖4：杜特帝臉書粉絲頁之疫情發文及按讚與愛心統計（2020/01/01~07/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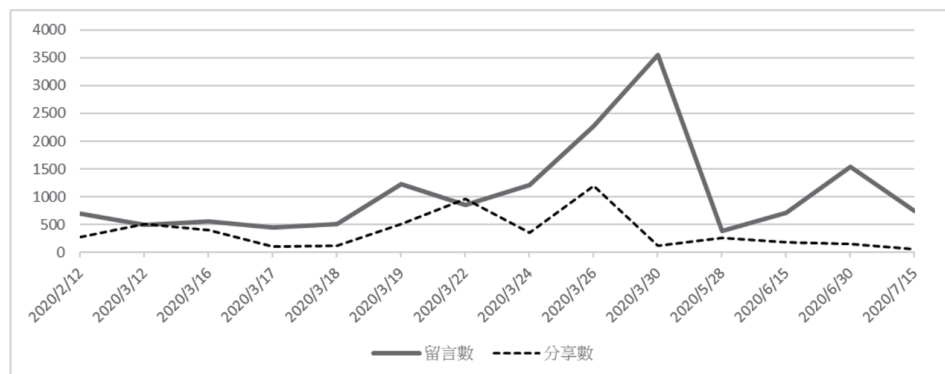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菲律賓總統杜特帝臉書粉絲頁 Rody Duterte (<https://www.facebook.com/rodyduterte/>)

（三）疫情發文及留言數、分享數

就留言數來看，14 則發文獲得留言總計有 15,198 則，網友分享轉貼則數有 5,213 則（請參見圖 5）。針對留言，進一步分析留言者發文所呈現的正、負面意見。研究發現 15,198 則留言之中，有 8,606 則留言是表達正面支持的留言，佔總數的 56.6%。3,171 則為反對或質疑意見留言，僅佔 20.9%。其他沒有明顯支持或反對之留言有 3,421 則，佔 22.5%。若以每一則發文的正、反留言數進行分析，所有發文留言，大多是支持留言者遠多於反對或質疑留言，只有編號 11 的發文（2020/03/30）是唯一反對或質疑留言數多過於支持留言數的發文（1282 支持：1712 反對），這則發文主要是在杜特帝政府施行強制社區隔離，同時也是杜特帝簽署《全國互助抗疫法》生效後一週，杜特帝在鏡頭前解釋該法案授權他的重要性，以及他讓呂宋島進入強加社區隔離的必要，並希望人民能夠支持和配合政府法令等等演說內容。

歸納支持立場的留言，首先是有一味讚許總統作為、感謝總統辛勞，以及同理總統努力想要做好但是有很多必須兼顧的困難等等。相對的，抱持反對或異議意見，則包括希望能夠重新開放航空交通讓家人團聚（回到菲律賓），指責菲律賓政府發放援助現金不公，更有大量網友留言是期望總統能夠解除社區隔離，讓人民回到工作崗位。

圖 5：杜特帝臉書粉絲頁之疫情發文及留言數、分享數（2020/01/01~07/3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菲律賓總統杜特帝臉書粉絲頁 Rody Duterte (<https://www.facebook.com/rodyduterte/>)

四、杜特帝線上防疫的民粹主義傳播風格

分析 14 則以 COVID-19 為主題的貼文文本，本研究發現，相較於既有研究所指出的民粹主義傳播風格特色，這段時間杜特帝呈現其特殊性。特別是打擊菁英、反建制、製造他者這樣的語言傳播特徵的消失，尤為明顯。以下歸納分析：

（一）訴求人民的傳播方式有所改變

既有研究指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傳播風格，往往透過情緒動員和重新定義人民的方式來建立人民為特定的想像共同體（林淑芬，2005；黃昱珽、蔡瑞明，2015；Bajar, 2017；Fuchs, 2018；Laclau, 2005；Jagers & Welgrave, 2007）。反應在防疫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若干民粹主義領導人採取直接訴求人民的作法，則會採取分裂團結、將人民區分為好的人民和壞的人民（Bayerlein et al., 2021; Burni & Tamaki, 2021; Dodds et al., 2020）。

從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可以發現，杜特帝經常使用我們（we）作為主詞，時而指稱協助人民防疫的政府人員，時而指全國一體。當他以作為總統（as your president）出發，則常以國人（countrymen）、菲律賓同胞（fellow filipinos）或者菲律賓語的我們同胞（our Kababayans），以國家整體作為想

像共同體的人民建立，而不是操弄反菁英感受，或者操作政治分裂來重新定義人民。此外，其論述主要是建立一個能苦民所苦的政府，是能追求人民公共（健康）利益的政府，並以此為論述基礎，傳遞出：要人民相信他（及他所領導的政府）能領導大家走出疫情苦海，因此請人民守法（遵守社區隔離政策）。並且將人民必須遵守防疫規定，將此定義為是人民的利益（people's interest）。根據 Hapal（2021）研究，杜特帝的防疫民粹主義特色，是採取指控不能遵守菲律賓政府防疫禁令的人，是頑固（stubborn）及缺乏紀律（lack discipline）的人，藉由道德指控的民粹語言，以此強化其政治權力，和建立軍事化的防疫鐵腕措施之合法性（同上引，pp. 10-15）。然而本研究發現，杜特帝臉書的文本內容是採取較柔性的論述方式，框定主題是因為：事關公共健康，也就是傳達為了大家—全國人民的健康，不得已才會採取嚴格的防疫防疫管制。同時以被動語法，在許多則的臉書發文內容重複提到，若違反規定就只好逮捕。

在不遵守防疫「你就是犯罪者」論述中，杜特帝採取被動修辭，來彰顯菲律賓政府是在不得已情況下才會動用非常態的緊急命令，以軍、警察作為國家管制人民的合法暴力手段。這樣的訊息傳達，一反其上任以來的硬漢政府作風，特別是與執行反毒戰爭所豎立的強悍、甚至警察國家的形象，有極端的不同。

我親愛的菲律賓同胞，今天我們正面臨著 COVID-19 的嚴重威脅。……我的菲律賓同胞，我知道你們之中有許多人擔心著世界的健康和我們所愛的人的福祉。你會感到焦慮、擔憂甚至恐懼，那是正常的。……我呼籲我們的人民保持鎮定，保持警惕，負責任，同時我也請求你的信任、合作和支持，……團結一起如同一個國家，因此可以克服這一挑戰。非常感謝你！（杜特帝臉書粉絲頁，2020/02/12 影像發文，轉騰逐字稿內容）

換言之，以作為總統這個大家長，訴求國人同胞的信任與團結，以克服疫情挑戰。內容不涉及問題的歸因，風險的擴大或預警，同時採取一種化約論的方式，簡化成：要團結、信任我（我＝政府），才能克服萬難（疫情）。而在這樣的脈絡框架下，杜特帝同時也將國人同胞都定義為是疫情受苦等待政府幫助、要相信政府就能得救的人民。整體而言，自這段時間的第一則發文，上述這種轉變人民訴求和立場的論述風格，就已經成為杜特帝臉書傳播

之風格和基調。

（二）打擊菁英和反建制的特色消失

在總統競選之初，杜特帝常倚靠打擊傳統家族政治、馬尼拉政治菁英，將之建構成為人民敵人（Arguelles, 2019; Curato, 2017; Pernia, 2019），有效贏得動員民意支持。然而分析防疫期間杜特帝的臉書粉絲頁，其內容並未再出現打擊菁英和反建制的傳播內容。分析歸納 14 則臉書發文內容，其主要的線上傳播內容，是傳達杜特帝政府是有責任和能力的政府，總統是共和國福祉的維護者，要人民相信政府、醫療專家、警察和軍人。特別是自 3 月份杜特帝政府發布社區隔離政策，其發布旅遊禁令、發布大馬尼拉隔離令，並且呼籲聽從專業醫療人員意見，「只有醫療專家才能夠幫助我們，所以！聽他們的話」（杜特帝臉書粉絲頁，2020/03/12 影像發文，轉騰逐字稿）。在編號 8 的貼文中，其更以總統文告的方式，呼籲全民共同為知識專家、菁英禱告。

為期四周的國家祈禱日，為那些正遭受 COVID-19 傷痛的能夠恢復而禱告，為那些失去所愛的能夠撫慰而禱告，為保護所有人而禱告，特別是，那些社會之中最脆弱的一群人。我們也為堅強者禱告，禱告我們在前線的傑出的醫療專業人員、醫護人員，和法律工作者、政府官員面對當前威脅的個人還有所有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的菲律賓人為了保護我們的社區、為我們社區犧牲的生命（杜特帝臉書粉絲專頁，2020.03.22）。

本研究發現，透過這樣的語言傳播過程，杜特帝除了將過去「反對的菁英」轉化成為人民「應該支持和寄望的對象」。軍隊和警察則是杜特帝反覆強調應該被遵從和支持的對象，探究箇中原委：首先是杜特帝的防疫手段之中，社區隔離令是最關鍵的作為之一，也是其與人民最容易相對立、會影響其民意支持度的作為。因為會構成與人民自由、經濟（仰賴自由活動）與民生等等一連串衝突、扞格。而負責執行社區隔離的要角正是軍警。因而杜特帝的民粹主義傳播中，就特別彰顯並且企圖轉化軍警成為幫助人民、人民必須信任和服從的人。「聽警察的話……我恨這個（限制你們的自由）……但問題是有一個（疫情）危機在那裡。所以你必須遵守（警察的規定）」（杜

特帝臉書粉絲頁，2020/03/16 影像發文，轉騰逐字稿內容）。

此外，杜特帝會採取自責、情緒式的民粹語言特色，如運用「我恨這個」（I hate it）。在這個線上傳播內容的一連串論述中，杜特帝用我（I）作為主詞，相對於其他時候他更常用我們（we），將之與反應情緒的動詞恨（hate），連結使用。一方面凸顯了民粹主義語言的真性情，藉由情緒用語、傳達出「我是不得已」的意涵，也同時展現一種貌似真誠之感，以成功讓人民形成一種共通感受，應相信他的「承諾」。相類似的傳播風格也展現在其他發文，他的承諾得以相應於真性情和親民的表達，也就承諾：一旦疫情能夠趨緩，「我會第一個宣布」（I will be the first to announce），宣布解除社區隔離。以此，杜特帝能有效傳遞出一個具說服性的訊息：「但在此之前，每個人都應該將社區隔離視為是一種新的常態生活（new normal）」（杜特帝臉書粉絲專頁，2020.05.28 影像發文，轉騰逐字稿內容）。

（三）唯一的共同敵人 COVID-19

在疫情期間，杜特帝在臉書發文中唯一明確指出是人民共通「敵人」的對象，就是 COVID-19 病毒。相對於 COVID-19 這個人民與政府共同的敵人，杜特帝在臉書的傳播內容中，時常會以我們為主詞，少數會用我（杜特帝）為主詞來表達。常用我們作為主詞，是為了傳達杜特帝作為總統，是已經成功克服不同黨派、部會和政府部門的分裂，成為唯一（團結一心的杜特帝政府）。此外，運用法律授權，杜特帝也表達他要改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決心和權力（由不同政黨不同立場、中央與地方利益立場不同，通通轉變為合作）。就這個論述的角度上，杜特帝亦不時使用感謝的詞彙，以建構自己是具包容和具總統高度的形象，來展現其統合各部門、各級政府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於反建制式語言，在這段期間杜特帝經常會刻意提及他的權力和團結的能力，是運用法治和憲法所賦予總統的權力。換言之，他是在民主制度下，去要求地方和人民接受政府的政策規範，他也要求軍警去「幫忙」地方，由此帶出警告，地方若不聽從就是地方濫權或者犯罪。

正當面對 COVID-19 威脅的時候，你的整個政府正攜手守護你的健康、安全和福祉。我們將會解決這個疫情大流行所帶來的所有不同問題，同時確任我們全體人民獲得保護，特別是在一線服務

的人民（杜特帝粉絲頁，2020/03/24 影像發文，轉騰逐字稿內容）。

杜特帝臉書內容，雖然企圖建構出杜特帝與各級政府，以及人民之間的（團結）關係，是與非防疫期間的民粹主義傳播風格迥異的。但在 COVID-19 是唯一的敵人的民粹傳播風格中，其仍然運用典型的衝突和戰爭隱喻，以此建立高度戰爭化的隱喻論述，「我們正在為生命而戰。我們正在與一個肉眼看不見的惡性無形敵人作戰。在這場非同尋常的戰爭中，我們都是戰士」（杜特帝粉絲專頁，2020/03/16 影像發文，轉騰逐字稿內容）。根據 Hapal（2021）的研究，戰爭化的隱喻一方面可以將 COVID-19 病毒比喻為看不見的敵人（unseen enemies），是杜特帝民粹主義的語言操作，使其可以讓長期宣布緊急命令、實施嚴格社區隔離政策獲得合法性。此外，也規避其大量採用軍、警進行強勢的防疫管控可能會引發的人民質疑或批判（同上引，p. 3）。進一步，本文認為，透過戰爭化的語藝，杜特帝自三月開始明顯地戲劇化疫情的危機，與此同時，杜特帝將人民與政府「團體在一起」，企圖轉化成一個統合的想像共同體，讓人民成為「我們都是戰士」，並引導支持者走向：共同打擊敵人才能致勝的想像路徑之上。

（四）寄望中國疫苗

不同於美國總統川普這樣的民粹主義領袖，企圖藉由強調中國武漢是 COVID-19 病毒的來源，進而批判中國隱匿疫情、防疫不力才使 COVID-19 大流行，藉此將中國政府建構為人民的共通敵人。杜特帝在臉書上則是特別感謝中國的幫忙，此點亦反應了杜特帝 2016 年選上總統後的民粹主義特色：

每個人都有上帝 --- 只要祈禱疫苗……。9 月，我認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中國將能夠進行分配。其他國家正在追趕。每個人都在努力，所以他們真的在盡力而為（杜特帝臉書粉絲頁，2020/05/28 影像發文，轉騰逐字稿內容）。

相對於前幾任的菲律賓總統，政策上多與美國密切保持關係，採取「親美遠中」的外交策略。杜特帝自 2016 年上任總統以來，使菲律賓受到各界關注的各項政治舉措之一，即是與中國在經濟與外交關係進行更為緊密的合作，甚至面對南海問題上刻意保持沉默，以換取中國貿易與援助投資等。有

政治學者解釋杜特帝政府走向「疏美親中」，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使菲律賓能夠平衡美中兩強對菲律賓的影響，並且藉此換取更多國家利益（翁明賢，2017；de Castro, 2017）。而在前述外交政策的轉變過程，也體現出杜特帝的民粹主義操作。根據 Montiel 等人研究指出，杜特帝當選菲律賓總統後，就藉由改變國家原本的親美路線，迅速轉向嚴厲批判美國而親近中國的政治路線，這樣的外交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之所以仍能獲得民意支持，跟杜特帝能藉由社群媒體展現其民粹主義傳播的政治影響力、政治動員力有關（Montiel et al., 2019）。

親中的民粹主義傳播方式，同時也反應在 COVID-19 議題上進行運作。在疫情期間，杜特帝在其臉書貼文影像中強調，中國幫忙的重要性。特別是將當時中國還在發展階段的疫苗，直接視為是解救菲律賓的良方，甚至是最大寄託（Teehankee, 2021）。因此，當世界上不少民主國家，紛紛將疫情大擴散的矛頭指向中國，杜特帝則能讓中國在其防疫論述中成為救兵，也成為值得菲律賓全民寄望的對象。

伍、討論與結論

過去研究指出，民粹主義傳播風格，其特徵是運用語言傳播來訴求人民、使民粹主義者能夠掌握代表人民的權力，而這樣的作法還需要兩項傳播方式來建立，也就是標舉反菁英／反建制和製造他者（排除某些特定群體），將之標舉為人民的敵人（Jagers & Welgrave, 2007; de Vreese et al., 2018）。而杜特帝過去確實也經常運用訴求人民，反菁英和製造他者與敵人的民粹傳播（Coronel, 2019; Montiel et al., 2019）。然而在疫情期間，他不僅不常在臉書發文，且內容大多使用影像來進行相關防疫政治傳播。此外，分析其防疫民粹主義傳播風格，亦不同於過去的研究發現。

這體現出既有的民粹主義傳播風格之研究發現，係建立在一般的（穩定的）社會狀態的情境下。相對於 COVID-19 疫情這種社會整體呈現高度不穩定、恐慌的情境，包含菲律賓政府在防疫上也處於高度不確定的因應狀態，使其傳播目的、策略與方式也相應產生變化。

本研究發現，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杜特帝主要是建立一個能苦民所苦的政府，強調自身是能領導政府以回應人民追求公共利益（健康）的需求；打擊菁英和反建制的民粹主義特徵消失，並反覆強調，人民應該支持和

寄望的對象，正是執行杜特帝政府防疫的菁英，包括政府官員、醫療專家、軍警等等；第三，唯一的共同敵人只有一個，也就是 COVID-19 病毒；最後，杜特帝在疫情期間，特別強調菲律賓仰賴中國的幫忙，並將中國正在發展的疫苗視為是幫助菲律賓脫離病毒威脅，視為是全民可期待，甚至是最大寄託 (Teehankee, 2021)。易言之，杜特帝的防疫民粹主義傳播論述，翻轉了以美國為首的「中國是疫情禍源論」，將中國視為是資源幫助者，特別是中國正發展的疫苗，也被其建構為，是菲律賓全民寄望的救兵。這樣的傳播內容，正是反應出杜特帝過去一貫親中的立場 (Montiel et al., 2019)。整體而言，在新冠疫情擴散期間，杜特帝線上防疫的民粹主義傳播風格是：(1) 訴求人民的傳播方式有所改變；(2) 打擊菁英和反建制的特色消失；(3) 唯一的共同敵人 COVID-19；(4) 寄望中國疫苗。

既有的經驗研究多指出，防疫期間的民粹主義傳播，往往不能夠為國家社會迎來防疫成功之「公益」，而是反應了民粹主義者希望獲得個人政治權力的「私利」 (Bayerlein et al., 2021; Buščíková & Baboš, 2020; Cachanosky & Padilla, 2019; Funke et al., 2020; McKee et al., 2020; Smith, 2020)，方法是將防疫危機擴大轉化為社會危機，讓民意從對疫情的不信任，轉而形成民粹主義的支持力量 (Burni & Tamaki, 2021)。反應在菲律賓的情況上，同樣面臨防疫不力的危機。許多民意調查亦指出，菲律賓民眾遭受到疫情負面衝擊。諸如根據菲律賓重要的社會調查研究機構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於 2020 年一系列調查可以發現，有高達 62% 的菲律賓成人認為生活品質變差，使他們自覺是魯蛇 (Losers)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2020, December 21)，七月份調查結果，成人處於失業的比率居高不下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2020, October 5)。十月份，針對全國成人的調查發現，有 85% 的成人對於可能染疫感到非常憂慮 (63%) 及憂慮 (22%)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2020, September 28)。然而根據菲律賓 2020 年 9 月公布的民調顯示，杜特帝政府的防疫作為，仍有高達 81% 的支持度，杜特帝個人更贏得 91% 民意支持。此數據結果似乎顯示了，擅長操作民粹主義的杜特帝「具有其政治韌性」 (Duterte's populism proved resilient) (Teehankee, 2021, p. 130)。

需進一步討論的是，民粹主義傳播與民意支持之間的關係，是否同樣表現在杜特帝的臉書粉絲頁之表現？藉由分析杜特帝臉書粉絲頁有關防疫的發文，和網友在其臉書上的互動、反饋可以發現，即便杜特帝臉書粉絲頁的發文頻率不高，但仍可吸引動輒百萬的瀏覽量，以及大部分貼文都出現正面留

言遠多過批判或質疑留言。由此可見，杜特帝臉書粉絲頁的線上防疫政治傳播，正持續發揮政策作用，創造一定的政治動員或說服效果。換言之，杜特帝透過臉書的民粹主義傳播，得以將其防疫不力的危機轉化為支持度。

上述研究發現有助於本文進一步反思，當疫情蔓延時，民粹主義領導者與民主防疫之間的關係。過去有關民粹主義運用社群媒體傳播的相關研究，注意到菲律賓高比例的臉書使用者，在 2016 年總統大選時，因為臉書的使用，所創造的個人政治選擇，是一種同溫層式的內團體聲音，以此相信特定候選人進而去投票。而這樣的同溫層世界是以一種反人權、反自由民主價值、反菁英和製造分裂的手段所造就的民選結果。因此，當臉書成為有效的傳播工具，則民粹主義領導者便更容易在民主政治中玩起威權的政治遊戲 (Curato, 2017; Flew & Iosifidis, 2020; Krämer, 2017; Salvador et al., 2017)。在疫情時代，杜特帝的臉書雖然呈現非典型的民粹主義傳播風格。但杜特帝正是示範了，不用訴求反菁英或製造他者，只是要能夠贏得人民相信、授權即可。而在這樣過程和結果，其能策略性的讓各種監督機制和不同利益訴求的人民團體，都被統合在「必須要團結對抗疫情的我們」這樣的想像共同體裡，使其能夠不去回應社會內部在面對疫情的多元訴求和各類危機。進一步，採取這種「訴求人民必須只能相信我」的傳播風格操作，同樣帶來威權統治的隱憂。因為在此過程中，杜特帝正是建立一種忽略民主社會核心價值的作法。當多元價值、表達自由和人民參與只被壓縮到只有支持和相信我是好的、只能服從我的政治動員。那麼，這樣的民粹主義傳播目的與效果，便可能會消除主權在民的價值追求。

反應在現實，歷經超過一年時間，2021 年 3 月，菲律賓疫情仍持續嚴峻。足見杜特帝政府未有效管理疫情，同時長時間採取嚴格的社區隔離，也被批評是罔顧人權。在時代雜誌 (Times) 一篇專文中便提到，杜特帝政府防疫失控但卻採取高度軍事化的防疫作為，受到諸多國、內外意見領袖的批評。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級專員 Michelle Bachelet 批評杜特帝政府是「高度軍事化疫情應對」 (“highly militarised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菲律賓大學政治學教授 Ela Atienza 批評，杜特帝仰賴軍、警來支持和實踐他偏愛的政策，恐危急菲律賓的民主運作 (Aie Balagtas See, 2021, March 15)。知名的菲律賓自由媒體 Rappler 製作專題，不僅指出杜特帝防制疫情的不力與威權手段，也揭示菲律賓在杜特帝一年多以來的錯誤防疫政策下，出現染疫人數居高不下。人權問題、經濟問題隨防疫問題惡化，菲律賓經濟被媒體批評

是：正處於二次大戰之後最糟糕的狀況（Rappler, 2021, March 25）。這說明了，杜特帝操作民粹主義、依賴軍事化管理，帶來的不僅是民主倒退的威權後果，也帶來菲律賓防疫的惡果。

因此，當新冠病毒疫情快速蔓延，加劇菲律賓社會危機與不安時，杜特帝透過網路所進行的防疫民粹主義傳播，雖然不再操作典型的反菁英、反建制。但其以薄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風格，仍是以違反民主精神的方式，以此形構成防疫民粹威權主義（epidemic prevention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作為探索性的研究，本文有若干研究限制。COVID-19 疫情至今已經超過一年半，不僅是 COVID-19 病毒持續演化，民粹主義政治人物也可能會不斷利用國內與國際的疫情變化，持續策略性發展新的民粹主義傳播方式。本研究係針對菲律賓疫情初始到菲律賓第一波本土疫情爆發前後，進行研究，較未能在研究發現中彰顯疫情前、中、後等不同階段之變化，進而藉此分析杜特帝線上防疫的民粹主義傳播，如何隨著疫情演變而進行操作。建議未來相關研究能夠藉由更長的時間軸來進行研究設計，以此檢視民粹主義傳播與威權主義作為之間的關係；其次，有關民粹主義在社群媒體運用之研究，涉及到政治人物與網友的傳播互動，根據本研究主題目標，目前僅需分析到發文以及臉友與貼文的互動數字，未能深究線上實際符號對話與箇中互動語彙內涵，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構思如何進行實際的留言之文本內容分析。最後，臉書粉絲頁雖然是杜特帝民粹主義施展的重要利器，然而杜特帝利用臉書發文的數量，自總統當選後明顯下滑，特別是到了 2020 年疫情爆發後七個月間，發文數僅有 17 則，應該跟其當選總統之後，擁有官方資源進行媒體掌控有關。然而本研究未能解釋，杜特帝何以在總統大選後的發文量會逐年下滑，此是研究限制。建議日後研究可以進一步進行個案分析瞭解民粹主義領導人在當選後對各類媒體使用的可能變化，以形成更為全觀的研究觀點，以此更具體分析社群媒體作為民粹主義傳播的意義。

參考文獻

- 王振寰、錢永祥 (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17-55。
- 自由電子報 (2016 年 11 月 10 日)。〈因為川普贏了！「東方川普」杜特蒂打算這樣做 ...〉，《自由電子報》。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0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882156>
- 林淑芬 (2005)。〈「人民」做主？民粹主義、民主與人民〉，《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2：141-182。
- 張佑宗 (2009)。〈搜尋臺灣民粹式民主的群眾基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5：85-113。
- 陶儀芬 (2008)。〈全球化、民粹主義與公共知識社群〉，《思想》，9：223-231。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n. d.)。〈COVID-19 全球疫情地圖 - 菲律賓〉，《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上網日期：2020 年 10 月 2 日，取自 https://covid-19.nchc.org.tw/dt_002-csse_covid_19_daily_reports_city_unique_mycountry.php?countryCode=PH/%E8%8F%B2%E5%BE%8B%E8%B3%93
- 黃昱珽、蔡瑞明 (2015)。〈晚近臺灣民粹主義的發展：「人民」與「他者」想像的形成〉，《思與言》，53 (3)：127-163。
- Aalberg, T., & de Vreese, C. H. (2017). Comprehending populi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 Aalberg, F. Esser, C. Reinemann, J. Strömbäck, & C. H. de Vreese (Eds.), *Populi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Europe* (pp. 3-11). Routledge.
- Abts, K., & Rummens, S. (2007). Populism versus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53, 405-420.
- Aie Balagtas See (2021, March 15). Rodrigo Duterte is using one of the world's longest COVID-19 lockdowns to strengthen his grip on the Philippines. *Time*. Retrieved May 2, 2021, from <https://time.com/5945616/covid-philippines-pandemic-lockdown/>
- Arguelles, C. V. (2019). "We are Rodrigo Duterte": Dimensions of the Philippine populist publics' vot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11(3), 417-437.

- Bajar, J. T. (2017). Online democracy: A content analysis of facebook pages of 2016 philippin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Journal of Mass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 7(2), 1-18.
- Bautista, D., & Lopez, M. L. (2020, April 21). TIMELINE: How the Philippines is handling COVID-19. *CNN Philippines*. Retrieved May 2, 2020, from <https://www.cnnphilippines.com/news/2020/4/21/interactive-timeline-PH-handling-COVID-19.html>
- Bayerlein, M., Boese, V. A., Gates, S., Kamin, K., & Murshed, S. M. (2021). *Populism and COVID-19: How Populist Governments (Mis)Handle the Pandemic*.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21:121). The Varieties of Democracy.
- Bueno, A. (2017, June 30). Duterte, the social media president. *CNN*. Retrieved October 2, 2020, from <https://cnnphilippines.com/life/culture/politics/2017/06/29/duterte-social-media-president.html>
- Burni, A., & Tamaki, E. (2021). Populist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ase of Brazil's president Bolsonaro.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14(1), 113-131.
- Bušítková, L., & Baboš, P. (2020). Best in covid: Populists in the time of pandemic.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8(4), 496-508.
- Cachanosky, N., & Padilla, A. (2019).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Independent Review*, 24(2), 209-226.
- Canovan, M. (1999).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47(1), 2-16.
- Coronel, S. S. (2019). The vigilante president: How Duterte's brutal populism conquered the Philippines. *Foreign Affairs*, 98(5), 38-43.
- COVID-Case Tracker (2019). *Republic of Philippine Department of Health*. Retrieved July 31, 2020, from <https://doh.gov.ph/2019-nCoV>
- Curato, N. (2017). Flirting with authoritarian fantasies? Rodrigo Duterte and the new terms of Philippine popu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7(1), 142-153.
- de Castro, R. C. (2017). The Duterte administration's appeasement policy on China and the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US alliance. *Philippine Political Science*

- Journal*, 38(2), 1-23.
- de Vreese, C. H., Esser, F., Aalberg, T., Reinemann, C., & Stanyer, J. (2018). Populism as an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style: A new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3(4), 423-438.
- Dodds, K., Broto, V. C., Detterbeck, K., Jones, M., Mamadouh, V., Ramutsindela, M., Varsany, M., Wachsmuth, D., & Woon, C. Y. (2020). The COVID-19 pandemic: Territorial, political and governance dimensions of the crisis.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8(3), 289-298.
- Engesser, S., Ernst, N., Esser, F., & Büchel, F. (2017). Populism and social media: How politicians spread a fragmented ideolog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 1109-1126.
- Ernst, N., Engesser, S., Büchel, F., Blassnig, S., & Esser, F. (2017). Extreme parties and populism: An analysis of Facebook and Twitter across Six Countr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9), 1347-1364.
- Esser, F., Stępińska, A., & Hopmann, D. N. (2017). Populism and the media: Cross-national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 In T. Aalberg, F. Esser, C. Reinemann, J. Strömbäck, & C. H. de Vreese (Eds.), *Populi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Europe* (pp. 365-380). Routledge.
- Etter, L. (2017, December 7). What Happens When the Government Uses Facebook as a Weapon? *Bloomberg Businessweek*. Retrieved October 2, 2020, fro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12-07/how-rodrigo-duterte-turned-facebook-into-a-weapon-with-a-little-help-from-facebook>
- Filc, D. (2011). Post-populism: Explaining neo-liberal populism through the habitu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6(2), 221-238.
- Flew, T., & Iosifidis, P. (2020). Populism, globalisation and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82(1), 7-25.
- Fuchs, C. (2018).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authoritarian movements and authoritarian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0(5), 779-791.
- Funke, M., Schularick, M., & Trebesch, C. (2020). *Populist leaders and the economy*. (ECONtribute Discussion Paper, No. 036). University of Bonn and University of Cologne, Reinhard Selten Institute (RSI).

- Gerbaudo, P. (2018). Social media and populism: An elective affin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0(5), 745-753.
- Hapal, K. (2021). The Philippines' COVID-19 response: Securitising the pandemic and disciplining the pasaway.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40(2), 422-442. <https://doi.org/10.1177/1868103421994261>
- Jagers, J., & Welgrave, S. (2007). Populism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yle: An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discourse in Belgiu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6(3), 319-345.
- Katsambekis, G., & Stavrakakis, Y. (2020). *Populism and the Pandemic: A Collaborative Report*. (POPULISMUS Interventions No. 7).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 Krämer, B. (2017). Populist online practices: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net in right-wing populism.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9), 1293-1309.
- Laclau, E. (2005). Populism: What is in a Name? In F. Panizza (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pp. 32-49). Verso.
- Lasco, G. (2020). Medical populism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Global Public Health*, 15(10), 1417-1429. <https://doi.org/10.1080/17441692.2020.1807581>
- Lassa, J., & Booth, M. (2020). Are populist leaders a liability during COVID-19? *The Conversation*. Retrieved July 4, 2020, from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re-populist-leaders-a-liability-during-covid-19-135431>
- Malindog-Uy, A. (2020, July 5). How The Philippines Is Fighting COVID-19. *The ASEAN Post*. Retrieved September 9, 2020, from <https://theaseanpost.com/article/how-philippines-fighting-covid-19>
- McKee, M., Gugushvili, A., Koltai, J., & Stuckler, D. (2020). Are populist leaders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pread of COVID-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10(8), 1-5.
- Moffitt, B. (2016).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ntiel, C. J., Boller, A. J., Uyheng, J., & Espina, E. A. (2019). Narrative congruence between populist president Duterte and the Filipino public: Shifting global allia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 Social Psychology*, 29, 520-534.
- Mudde, C.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541-563.
- Mudde, C., & Kaltwasser, C. R. (2012).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reat or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üller, J. W. (2014). “The people must be extracted from within the people”: Reflections on populism. *Constellations*, 21, 483-493.
- Office of the Presidential Spokeperson (2020, February 6). COVID-19 Timeline. *Facebook*. Retrieved May 2, 2020,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PresSpokespersonPH/posts/covid-19-timeline/1082510122084039>
- Pernia, R. A. (2019). Human rights in a time of populism: Philippines under rodrigo duterte. *Asia-Pacific Social Science Review*, 19(3), 56-71.
- Popping, R. (2018).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using semantic text analysis: A comment. *Quality & Quantity*, 52(5), 2163-2172. <https://doi.org/10.1007/s11135-017-0651-z>
- Postill, J. (2018). Populism and social media: A global perspectiv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0(5), 754-765.
- Rappler (2021, March 25). EXPLAINER: What went wrong with Duterte's pandemic response? *Rappler*. Retrieved May 2, 2021, from https://www.rappler.com/video/video-explainers/explainer-duterte-government-coronavirus-pandemic-response-one-year-after-march-2021?mc_cid=03e841cac1
- Rody Duterte (n.d.). *Home* [Facebook page] Facebook. Retrieved July 31, 2020,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rodyduterte/>
- Saguin, K. (2019). “Return the lake to the people” : Populist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fate of a resource frontier in the Philippin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09(2), 434-442.
- Salvador, P., Vivar, P. C., de Vera III, E., Inocian, R. B., & Rosaroso, R. C. (2017). Influence of Facebook to voters’ political practic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Arts and Sciences*, 4(1), 15-23.
- Senate of the Philippines (n.d.). Republic Act. No. 11469. Retrieved May 2, 2020, from <http://legacy.senate.gov.ph/Bayanihan-to-Heal-as-One-Act->

RA-11469.pdf

Smith, A. D. (1986). State making and nation building. In J. A. Hall (Ed.), *States in history* (pp. 228-263). Blackwell.

Smith, A. E. (2020). Covid vs. democracy: Brazil's populist playbook. *Journal of Democracy*, 31(4), 76-90.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2020, October 5). SWS September 17-20, 2020 national mobile phone survey - report No. 5: Adult joblessness remains very high at 39.5%.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Retrieved February 2, 2021, from <https://www.sws.org.ph/swsmain/artcldisppage/?artcsyscode=ART-20201005200818>

_____. (2020, September 28). SWS September 17-20, 2020 national mobile phone survey - report No. 3: Filipinos worried about catching covid-19 remain high at 85%.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Retrieved February 2, 2021, from <https://www.sws.org.ph/swsmain/artcldisppage/?artcsyscode=ART-20200928194150>

_____. (2020, December 21). Fourth quarter 2020 social weather survey: 62% of adult Filipinos got worse off in the past 12 months.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Retrieved February 2, 2021, from <https://www.sws.org.ph/swsmain/artcldisppage/?artcsyscode=ART-20201221204642>

Taggart, P. A. (2000). *Populism*. Open University Press.

Teehankee, J. C. (2021). The Philippines in 2020: COVID-19 pandemic threatens Duterte's Populist Legacy. *Asian Survey*, 61(1), 130-13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May 9).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the Philippin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trieved July 5, 2020, from <https://www.who.int/philippines/emergencies/covid-19-in-the-philippines>

Wikipedia (n.d.). Philippine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Wikipedia*.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20,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ilippine_government_response_to_the_COVID-19_pandemic

Yin, R. K. (201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SAGE.

Zabala, S. (2020, April 21).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a threat to populist strongmen. *Al Jazeera*. Retrieved May 2, 2020,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coronavirus-pandemic-threat-populist->

strongmen-200421105729756.html

本文引用格式

張春炎 (2022) 。〈民粹國家領導人及其線上防疫傳播之研究：以新冠疫情下菲律賓總統杜特帝的臉書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2 (1)：153-188。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11201006

Chang, C. Y. (2022). Populist leader's online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ase study on Philippine president Duterte's Facebook.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1), 153-188.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11201006 [Text in Chinese]

附錄、疫情以來杜特帝臉書發文統計 (2020.01.01~07.31)

編號	日期	主題	型態	內容概述
1	2020 2/13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像長度 3 分 37 秒 針對疫情，總統單獨面對鏡頭對人民發表談話 杜特帝個人談話逐字稿 (673 字)
2	2020 3/12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像長度 1 小時 3 分 47 秒 於總統府召開記者會，宣布採取 IATF 建議，未來將實行的防疫政策內容 杜特帝個人談話逐字稿 (4,701 字)
3	2020 3/16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像長度 54 分 49 秒 杜特帝在總統府大廳主持 IATA 會議並提供政策指導 杜特帝個人談話逐字稿 (5,629 字)
4	2020 3/17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1 小時 17 分 36 秒 IATF 在總統府新行政大樓舉行記者會，報告疫情狀況 杜特帝未出席
5	2020 3/18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1 小時 39 分 4 秒 IATF 在總統府新行政大樓舉行記者會，報告疫情狀況。記者會作為主畫面，增列一個片頭約 20 秒，內容為杜特帝為主角的防疫影像 杜特帝未出席發表談話
6	2020 3/19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14 分 31 秒 杜特帝宣布，對整個呂宋島實施「加強社區隔離」，並向所有相關地方政府單位 (LGU) 發出防疫指示。 杜特帝談話逐字稿 (1,470 字)
7	2020 3/22	以疫情為主題	總統文告 PDF 檔案	文件為兩頁的長度 主題：宣布 2020 年 3 月的第四週為全國祈禱週 (為全國防疫祈福)
8	2020 3/24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11 分 58 秒 杜特帝單獨面對鏡頭，向全國發表的致辭，並對所有衛生專業人員和前線人員表示感謝。 杜特帝談話逐字稿 (1,133 字)
9	2020 3/26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1 分 42 秒 「我們不會讓任何人落隊」宣傳影片，名片名稱作為杜特帝的對抗新冠疫情的戰鬥口號，剪輯疫情下的人民生活畫面，然後強調杜特帝向人民保證，政府會全力解決疫情所帶來的所有問題，更會提供各種援助，尤其會幫助社會邊緣人 杜特帝談話逐字稿 (144 字)
10	2020 3/30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24 分 53 秒 杜特帝總統針對疫情，對人民發表談話 杜特帝談話逐字稿 (1,970 字)
11	2020 5/23	總統文告慶祝穆 斯林齋戒月結束	總統文告 PDF 檔案	單頁文告 慶祝齋戒月結束

編號	日期	主題	型態	內容概述
12	2020 5/28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1 小時 20 分 51 秒 杜特帝于總統府的會所主持會議並公開對人民宣布 5 月 31 日將採取新隔離措施，除重申嚴格的隔離規定，也宣布會經由遠距方式，幫助受影響的學生、工人和企業 杜特帝與 IATF 成員談話逐字稿 (8,763 字)
13	2020 5/31	祝在達卯市擔任市長的女兒生日快樂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1 分 47 秒 杜特帝在總統府單獨面對鏡頭祝女兒生日快樂及表達父愛 杜特帝談話逐字稿 (151 字)
14	2020 6/12	慶祝菲律賓獨立紀念日	影像播出	影像長度 1 分 52 秒 杜特帝在總統府單獨面對鏡頭描述獨立紀念日對菲律賓的意義 杜特帝談話逐字稿 (127 字)
15	2020 6/15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48 分 1 秒 杜特帝對人民發表談話，宣布政府將施行的新防疫管理政策，這是由 IATF 擬定的新防疫計畫。杜特帝也對於隔離所造成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表達憂心。呼籲全民配合防疫政策和自我健康管理原則。 杜特帝與 IATF 成員談話逐字稿 (5,521 字)
16	2020 6/30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46 分 22 秒 根據 IATF 在總統主持的會議上提出的建議，杜特帝宣布新的檢疫措施將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15 日生效。以及宣布解新的地區實施隔離。 杜特帝談話逐字稿 (4,239 字)
17	2020 7/15	以疫情為主題	影像播出	影片長度 28 分 23 秒 杜特帝出席 IATF 會議宣布了全國各省市的最新社區隔離分類。新的隔離狀態將於 2020 年 7 月 16 日至 31 日生效。會議內同時有許多醫生和衛生工作者一起與杜特帝呼籲人民，遵守防疫健康指引，能控制新冠病毒傳播 杜特帝與 IATF 成員談話逐字稿 (3,347 字)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菲律賓總統杜特帝臉書粉絲頁 Rody Duterte (<https://www.facebook.com/rodyduterte/>)

Populist Leader's Online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ase Study on Philippine President Duterte's Facebook

CHANG, Chun-Ye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how populist national leaders use social media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By examining Philippine President Duterte's use of social media, the researcher identified four populist communication styles in his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ssages: (1) The way to "appeal to the people" has changed; (2) The anti-elite and anti-establishment messages have disappeared; (3) COVID-19 is defined as the only common enemy to people; (4) A hope is constructed for people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pandemic has to rely on the aid of Chinese vaccines.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 that Duterte's online populist messages were full of self-praising of his own pandemic control policy, his plans, and his officials. However, since Duterte's messages were still expressed in the styles that violated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it is afraid that a kind of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was formed in the name of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words: populism, Duterte, social media, the Philippines, the COVID-19 pandemic

* E-mail: cychang@mail.ncnu.edu.tw

Received: 2021.02.01; Accepted: 2021.11.12